



[关于我们](#) | [成果选登](#) | [动态新闻](#) | [人才培养](#) | [学术论坛](#) | [专题研究](#) | [网友留言](#) | [文献资料](#) | [论著索引](#)

您当前的位置为:[\[首页\]](#) >> [\[动态新闻\]](#)

●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日期: 2005-3-30 15:21:37 作者: 杨海文 人气: 383 【字体: 大 中 小】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杨海文

沿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及无数先驱者的足迹和方向，中国已经蹒跚地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坎坷历程。时间是如此地漫长，成果是如此地丰厚，以致中国的从业者们，对黑格尔当年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过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真正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中国人）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认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这些听来逆耳的名言，差不多快要遗忘德里达2001年9月在其中国之旅中再次指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和这一谈话经由知名接招为契机，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危机”以及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学科期望”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对此进行“华文摘”2003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5期就此给予专题转载，到《学术月刊》《书报》将此评为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就鲜明地显示了学术界与期刊界对于中国文科这一自我反省、本已超越的相互认同和相互支援。

一、在“特殊性”中发现哲学

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逻辑前提当然是反思“什么是哲学”。假如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确乎是古希腊、罗马的产物和西方精神世界的文化传统。但是，那么多西方哲学家从来就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也是我们阅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弗兰克·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哲学史教程》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更何况，“走出哲学”还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一面宣告了知性类型的哲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宣告了基于“存在存在”和“生活世界”的哲学。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哲学”在终极意义上应该是不会有文字式定义的，也没有不变的“哲学”——“哲学”正是因其在本质上无定义而显得千姿百态，的确昭示了哲学永远“在途中”但同时启发我们务必拒绝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坚持在“特殊性”的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

在古希腊时代中，特别是在苏格拉底这个真正的哲人看来，“爱智慧”与“爱知识”是不同的哲学家与“爱知识”的智者更是不同的。明于此，我们就应该批判地对待西方哲学在尔来历史中朝着本体论和认识论发展的潜在危险。实际上，当本体论哲学“含辛茹苦”地去述说客观的不过是科学家该做的工作而已，但结果使得哲学变成了科学；当认识论哲学“孜孜不倦”地研究世界时，它做的不过是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该做的工作而已，但结果使得哲学变成了心理学和语言学，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都忘记了本己的使命，没有把自己的目光投向真正的人类生活。哲学在今天也迫切需要“让存在如其所是地存在”。

作为一门学科，哲学固然有其“知识态度”。哲学起源于惊奇，问题本身就是一条道路，所以自始至终是一部“问题史”，因为哲学就是对于先前哲学留下的未曾解决的“问题”予以解

自身也给后继者留下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哲学同样有其“元学立场”。现代的人们都会切身体会到：“人生而自由，但却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既然人所追索的一切都是起始于人而又返回于人，那么，对于人性的研究就应该合情合理地具有比之所有其他对于实在的研究更为崇高的尊严。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态度和以“人”为关怀的元学立场，我们现在不妨为哲学设计一个“元学立场”：哲学是置身于日常生活与经验世界的形下之域中的活生生的人（尤其是以哲学为己任的哲学家）对自身蕴涵的智慧之境进行的形上之思。此思从本质上看乃“道的体贴”，从形式上看乃“名”与“实”的相即。中国古代哲人所谓“道在器中”、“体用不二”，也正好简约地揭示了“道的体贴”蕴涵于“道”与“器”中、“人”在“问题”中自我实现、“元学立场”与“知识态度”相离相即这一道理。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内涵、以概念体系和逻辑方法为外延。且仅当以此标准去审视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印度时，中国、印度可谓只有思想而无哲学。上述关于哲学的“工作定义”有助于哲学“回到它本身”，那么，或许包括逻辑方法、概念体系和逻辑态度”会使得哲学成为哲学（确切地说，是成为哲学之林中的某一样式），但使得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正是一颗颗敏感、执著的哲学心灵立足于“元学立场”而对智慧之境所做的形上之思。正如世界不是“单线发生”而是“繁星满天”一样，哲学史也是多线发展、多头前行的，多线的哲学史，哲学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很显然，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普遍性”的哲学共性，我们才将知道“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哲学生态终究要呈现并敞开的是“殊途同归”的哲学心灵，我们才会承认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的民族，而且这个民族在世界哲学之林中是一个极其具有个性与独特性的“社区”或“部落”。

对于西文中的“philosophy”，日本学者西周曾经先后使用“希贤学”、“希哲学”、“哲”翻译，最后选定的则是“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从业者们自然知道“希贤”一语采自《礼记·礼运》中的“士希贤”，更知道西周翻译的“哲学”一词经由晚清旅日诗人黄遵宪的推介传入中国，及到了汉语知识界的每个角落。由此，像彭永捷以为在中国谈论“哲学”很可能是一个“错位”的结果，像张祥龙主张以“中学”或“中国古学”替代“哲学”这个概念，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对世界的坏命名，是对世界增添不幸。”“能必副所”杜绝了“能指的狂欢”，“哲学”非一个“坏”的命名。诚然，真诚地去运用、养护、坚守而不是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真正的理由在于：不仅中国在过去悠久的历史是“拥有”哲学的，而且哲学在未来中国的论语中也是必须“在场”的。

二、问题意识在“母语”中的自我表达

从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看，无论“以西释中”者，还是“以中释西”者，都曾经“有”哲学，而且以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撰述来“证明”中国过去是有哲学的。但是，中国哲学（史）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这些努力却依然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理解和认同呢？里达还像黑格尔当年那样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呢？因而，就像应对古典中国有没有“宗教”一样，即使我们承认中国是“有”哲学的，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危机”是个假问题。换言之，说中国过去“有”哲学并不等于说哲学现在“在”中国。这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现在我们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危机”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予以讨论，绝对不是为了“简单判断”并颠覆西方话语霸权下德里达式的“简单判断”，而是旨在“现实地”去激活并发展“中国哲学在中国”这一“现实使命”。

从当前的视角看，所谓“哲学在中国”，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外来的思潮与流派在当代中国的“风云际会”，一是指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学科和作为元学立场的“薪火相传”。同样是从当前的视角看，所谓“中国的哲学”，亦即人们通常使用的“中国哲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哲学，即中国古典哲学；一是指当代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对于经由金岳霖、冯友兰阐发并日益鲜活起来的“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组范畴的丰富内涵乃至每一层意义，我们是不能以“价值中立”而求“客观”的立场去审视的。在“思维经济原则”的引导下，我们尤其需要以广义化了的“中国现实”为参照，去建立并展望“中国‘有’哲学”因而“哲学‘在’中国”的内在关联。

从1902年《新民丛报》首次将西周1873年翻译的“哲学”一词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到

哲学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后于1916年、1919年公开出版，从1919年新任北京蔡元培将1914年设立的“中国哲学门”更名为“哲学系”，到留学欧美的张颐1923年回国主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如此等等，足以见证作为名词概念的、作为知识体系的、作为专业；在汉语言说中、在汉语创作中、在中国大学中的“安家落户”。一旦“哲学”在中国“安家”么，无论从“史学之维”去研究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还是从“哲学之维”去探求包括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在内的哲学分支学科，都可以、而且应当视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具体表现，换言之，广义化了的“中国现代哲学”在中国目前的学科目录中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的代名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中国古典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势必从属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宏大叙事之中。现在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其自身实践是否丰富了“中国现代哲学”是否支援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目标。换一个提问的方式：既然“中国传统哲学”乃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无法规避并须大力开发的背景资源，“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否在帮助现代、亲近传统这一方面做出了真正的贡献呢？回答是令人失望的。对此，彭永捷中肯地说过：我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传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陈少明也曾经揆适、侯外庐到任继愈等的著述，很难让人感受到古典中精彩的一面。任何读流行教科书的人，定会有对不上号的印象，这导致‘中国有哲学吗’的疑问的重新提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置身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宏大叙事之中来思考，我们才将明晓：包括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现代哲学”自身创新发展力的匮乏。“先立乎其大者，然后小者不可夺也”，由此，去寻求中国哲学（史）“超越之路，重中之重就在于凸现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的“自我表达”。很显然，使得“中国现代哲学”充满着创造性和发展力的“问题意识”，必须是渊源于中国国展开的，尤其是必须与中国当代的社会生态和文化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此前提下，这至少必须具备根本性、时代性、学理性三个重要特点。所谓根本性，在于这一“问题意识”以人以理性方式对于世界极限和智慧极限的一种再反思和再追问；所谓时代性，在于这一“问题意识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以各种翻新的方式重新凸现出来的，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家们的兴奋点；所谓学理性，在于这一“问题意识”要构成自己相对独特的哲理性表述方式，在学的话语体系中展开。从而，如果说中国哲学试图借助“讲自己”而踏上并走完超越“合法历程，那么，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的“自我表达”，诚如张立文所言，就要实实在在地讲述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自己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对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自己对“形而上者之谓道”的赤诚追求。

因为每一个、每一次在“问题意识”关照下进行的哲学活动都等于把哲学史又重写了一遍，理性的哲学建构只有进入“哲学史”的长河中时才将拥有永恒的生命。“哲学史研究”与“哲学”有着区别，但是，“问题”也在“历史”和“经典”之中，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的“哲学研究”必须把“哲学史”当做如今仍然正在探索的问题来加以把握，从而才有可能“回到事情本身”。是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对于未完成时态或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哲学”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地说，一方面，当“中国现代哲学”以本己的“问题意识”去开发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哲学史研究”才能真切地经由“以中释中”的阐释活动得以启发我们的哲学创作、达成我们“中国哲学史研究”才会使得本土的资源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当“中国现代哲学”以本己去借鉴外来哲学传统的优秀素质时，“外国哲学史研究”才将恰当地通过“以中化西”的解构的哲学视野、成就我们的终极关怀，“外国哲学史研究”才会使得外来的思想洋为中用。这体现，广义化的“中国现代哲学”也就会通过史学维度的“中外对话”去探求并抵达哲学维度“彰”，进而现实地完成“中国‘有’哲学”、“哲学‘在’中国”的现实使命。当然，“我”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哲学”，——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华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态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这样，能否“重写”好中国哲学史，也“现代哲学”当前能否在本己的文化语境中自我表达其“问题意识”的最佳证明。

三、“重写”中国哲学史如何可能？

虽然谢无量191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从学科上系统论述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众所周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则是胡适1919年2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初期先后在神州国光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其中的关键原由是与土生土长的谢无量相比，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冯友兰善于以“西方的方法”来“组装中国的‘哲学’”。毋庸讳言，在整个20世纪的汉语语境中，洋溢在胡适、冯友兰身上的“以西释中”的治学理念，亦即胡适以西方的实验主义、冯友兰以西方的新实在论去解读“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做法，是备受知识界和一般读者的欢迎与拥戴的。诚然，也有“以中释中”的治学理念，在针砭着这一主旋律。遗憾的是，在这些人物中，至少大师级的牟宗三给我们的强烈印象还是“引领”陆王心学。

在解释学看来，“重写”是诠释的存在方式乃至存在本身，因为“重写”使得每一代人能够以自己的提问方式、在解构中重建崭新的答问策略，学术、思想、文化的历史也是因为每一代人而生生不息的。“重写”当然不全都是“适度诠释”，毋宁说“过度诠释”才是“重写”最一帆风顺的“适度诠释”是合理的，在圈子中走弯路的“过度诠释”也是正常的。海德格尔说：“得安于绕圈子。这并非权宜之计，亦非缺憾。走上这条道路，乃思想之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的节日——假设思想是一种行业的话。”只要我们深知“真理”从来是在“意见”中旅行并最接近真理的，那么，无数先驱者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留下的宝贵财富就不能简单地被跨越，更不容轻易抛弃。尽管如此，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途径依然不是“照着讲”，不是“接着讲”，而是“自己讲”。“自己讲”之际“讲自己”。对于“自己讲”或“讲自己”来说，真正的“问题意识”是其恰当的“写作方式”是其对象化的表达，前者乃“体”，后者乃“用”，“纲举目张”必定“中”。从而，也许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能够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转向“实践性的哲学”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去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

“重写”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创新”，无疑得与西方哲学在“写作方式”上发生关系。因此，指向以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的“认知性的哲学”，仍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2版）的张立文所指出，我们要经由表层结构的具体诠释、深层结构的义理诠释、整体结构的“贴”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核心灵魂。但是，分析的方法毕竟只是哲学的工具，还不是哲学本身。哲学定义为并等同于“论证的技术”，“哲学”也就必然终结。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从前期写作的《逻辑哲学论》（1922年发表）转向后期从事以“人的生活形式”为母题的《哲学研究》（1953年版），即是有力的例证。事实上，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上以“以西释中”而非“以中释中”的研究传统及其惨痛教训，也反复地警醒着我们“需要哲学上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中的‘退耕还林’”，原因在于：要是纯粹地、一味地追求范畴逻辑化、对象科学化的话，“中国哲学史”就难免不外是以不断变换着的西方哲学流派、学说来重新解读中国哲学文本的“中国哲学”就难免不外是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的中国演绎版。

在台湾学者劳思光看来，“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追求的是“什么”（what），哲学活动视为一种追求知识及建立知识体系的活动，并以建立某种客观的知识为其目标；“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探究的是“如何”（how），是要将个体的和群体的意志引导到向上去，并以达到某种创造性的转化为其主旨。换言之，“认知性的哲学”固然可以放宽视野、启发我们的哲学创作，然而，“引导性的哲学”则能够达成我们的境界追求、成就我们的哲学理想。论在“哲学史研究”中，还是在“哲学研究”中，“引导性的哲学”在哲学本性和深度自由上优于“认知性的哲学”的。于是，试图达到存在的转变与完善的规范性立场的“引导性的哲学”在20世纪中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重写中国哲学史时引入并展开“引导性的哲学”，最关键的目的是激活并焕发中国哲学的创造性。王中江指出：“我们越来越精细化，但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一个整体性的中国哲学，或空洞的中国哲学。借用韦伯所说的‘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的灵魂和伟大的灵性。我们要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获得‘突破’，我们必须发现中国哲学的伟大。”

性。”一方面，从被研究的“客观对象”看，哲学在中国哲学家那里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诠释者的“主观诉求”看，一种活的本真的哲学思考，一种哲思，必须有能力进入日常生活！握实际生活中貌似不足挂齿、实则感人至深的东西。“我们古老的哲学，在今天这个众声喧哗的年头，多么需要——你我他的青春的鼓舞。”以心交心方能心心相印，就此而言，因为中国最关注生命的哲学，中国古典哲学是最追求体悟的哲学，所以，处于“重写”状态之中的中国以最平常的心境，去邀请孔孟老庄、程朱陆王……那些最睿智的心灵。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还要求我们从“经典解释学”角度去进一步辩证地处理“理念诗”的相互关联。所谓经典，不仅理所当然地包括“文以载道”的经典著作，而且责无旁贷“载道”的经典心灵。“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经典本文之理解与人物个性之品评当得其有！再现‘理性史之纹路’与‘理念诗之魅力’，如是，我们也能有相当的理由质疑那种一开始！的、严格的因果对应的方式来图解思想家之思想的努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诠释’所导致的诠释者对本文及其所赖以产生的周围世界的轻忽和放逐。”由此，旨在对中国现代阐释的经典解释学，既要通过“论证的技术”恰当地将过去的诗化编码转换为今天的逻辑！由“认知性的哲学”清理出“理性史之纹路”；又要借助“体验的艺术”生动地使哲学的古典！生的现代境遇，亦即经由“引导性的哲学”再现出“理念诗之魅力”。所以，在重写中国哲学！式”上，尽管特别强调要从“认知性的哲学”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但也并不能简单、！知性的哲学”与“引导性的哲学”的相互依存。有此相互依存，有此历史转进，“重写”中！得可能。

综上所述，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既要直面“过去”，更要考量“现在”。假设黑格尔！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那他无疑也会承认古老的中华民族是“！是，客观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与主观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逻辑上并非一回事，“！“哲学研究”在逻辑上也不是一回事，而它们在历史中的断裂更会严重地影响到广义化的“！在当今天世界哲学舞台上的深度和风度，这样德里达的评判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于是，问题的！义化的“中国现代哲学”今天如何去寻找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有“！机，所以，真正的“问题意识”必须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也正是在此前提下，！代哲学”这一大家族中的生力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从业者应该在“范式创新”的实践！科建构意义上的“重写”充满着哲学的、中国的、现代的“个中三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并且，与过去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被迫”现代化相比，这种“主动”现代！本己的“问题意识”和切合实情的“写作方式”去丰富和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的重大努力，！促成并证明中国现在“拥有着”哲学、哲学“存在于”当代中国的人文厚望。

（2004年2月13日写成于中山大学。提交2004年3月20~21日在北京召开的“重写哲学史与学术研讨会和2004年4月7~10日在杭州、上海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2004年会暨中国传统哲学研讨会”。原载石家庄《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上海《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2004年第7期全文复印；第3节以《“重写”中国哲学史！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7月22日“学术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

中山大学中文系 版权所有 [联系我们](#)